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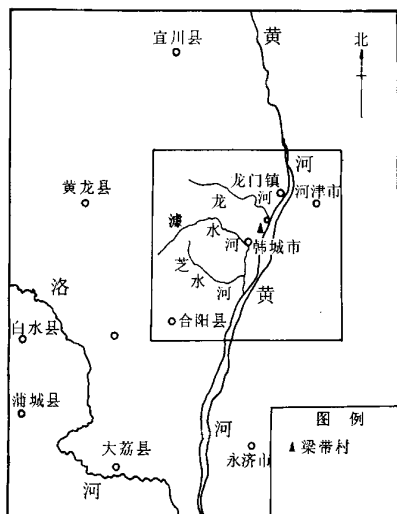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韩城市文物旅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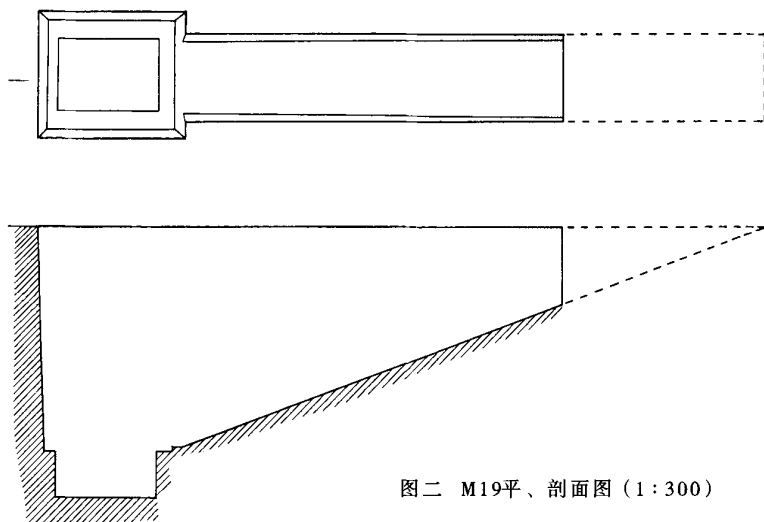
韩城市位于陕西省东部，地处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东濒黄河，隔河与山西乡宁、河津、万荣相望（图一）。境内古代遗存丰富，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为陕西省各县市之冠。

遗址所处的梁带村隶属韩城市胥村镇，位于市区东北7公里处黄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是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2004年8月，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发现梁带村北部有古墓葬，且有几座惨遭盗掘。2005年4月，陕西省文物局指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队，对梁带村进行调查和勘探，以了解墓地的年代、性质和分布范围。随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韩城市文物旅游局联合组成的韩城考古队，对梁带村北进行了第一次勘探，勘探

面积30000余平方米，共发现两周墓葬103座、车马坑17座，其中大墓4座。同时对墓地的范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M19平、剖面图（1：300）

围进行了调查走访和抽样勘探，初步确定墓地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330000平方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韩城考古队负责对3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M19、M27、M26）进行了抢救性发掘。M19是最先发掘的大墓，发掘工作于2005年5月开始，年底结束，历时6个月。现将M19发掘

所获简报如下。

一、墓葬位置及层位关系

此次发掘的M19与M26、M27成组分布于整个墓葬区的中东部，M19东距M26约8米，西距车马坑（K1）约60米。叠压墓葬的地层分为3层，第①层为耕土层，厚0.15-0.20米；第②为现代层，厚0.40-0.45米，距地表深0.60米，土色为黄褐色，土质结构较密，含有少量的绳纹陶片；第③层为红土层，厚0.30-0.40米，土质纯净，无包含物。

二、墓葬概况

（一）墓圻形制

M19为单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圻墓（图



图四 M19玉器出土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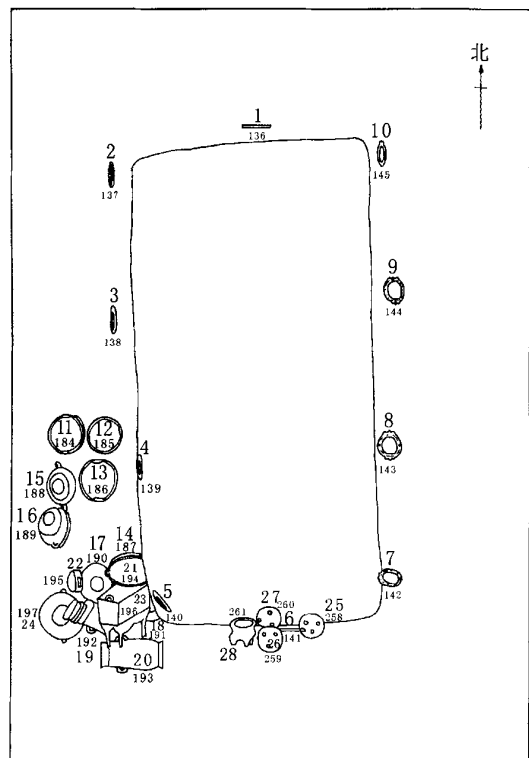


图三 M19棺椁遗迹

二），墓向200°。墓口长6.50、宽5.50米，墓底长5.73、宽4.70米，墓底距地表11.98米。墓道接于墓室南部，斜坡状，墓道口长26、宽3.77米。墓道和墓室均有收分，呈口大底小状，内为五花填土，其堆积层次基本相同，夯打较为密实。填土共区分为28层，其⑰⑱层夯打密实坚硬，厚约0.15~0.18米，夯窝直径约0.02~0.04米。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台面距墓口深9.95米。北面台面宽0.48~0.51米，东边台面宽0.76~0.86米，南边台面宽0.65~0.75米，西边台面宽0.81~0.86米，在其中部有两具殉狗骨架，狗骨架通长0.85米，头骨保存完好，牙齿紧扣，四肢散乱，似作挣扎状，且在其颈部发现有麻绳痕迹，推测当时所殉应为活牲。

（二）葬具

M19葬具为一椁两棺（图三）。椁室长



图五 M19青铜礼器、棺环出土位置图 (1/3)

- 1~10.棺环 (M19:136~145) 11~14.鼎 (M19:184~187)
15~18.簋 (M19:188~191) 19、20.壶 (M19:192、193)
21.盘 (M19:194) 22.盂 (M19:195) 23.甗 (M19:196)
24.盖盆 (M19:197) 25~28.鬲 (M19:258~261)

4.55、宽3.12、深1.73米。椁板由顶板、侧板、挡板和底板构成。顶板共18块，东西向横铺，尽管中央塌陷严重，但仍能清晰地测知每块顶板宽0.20~0.30、厚0.12~0.15米，板面上残存席纹。侧板和挡板均为8块叠砌而成，其中每块侧板长4.55、宽0.20~0.30米，每块挡板长3.12、宽0.20~0.30米。底板由15块组成，南北放置，每块长4.60~0.70、宽0.15~0.23米。底板南北两端垫有枕木，枕木长3.51米、厚0.13~0.16厘米，两端伸入东西二层台内。

外棺长2.43、宽1.10米，顶板由6块南北向纵铺的木板构成，侧板、挡板仅存残高50厘米。棺顶和两侧板外均发现有布纹，且布纹上有红彩绘制的水波纹图案，推测棺外可能有荒帷。内棺长2.23、宽0.90米，腐朽严重，顶板、侧板、挡板结构均已无法看清；底板由6块南北向纵铺的木板构成，每块宽0.15~0.19米。

(三) 随葬品放置情况

M19装饰物及随葬器物丰富，遍及椁室和棺内。椁室周壁悬挂大量串饰，摆放规整，组合清楚（图六、图七）。具体分为两种：一种由两条青铜鱼和3~4串玛瑙珠串饰相间组成，玛瑙珠串饰则由陶珠、玛瑙珠和两枚海贝穿联而成，悬挂于南、北挡板；另一种由青铜鱼和陶珠串饰相间组成，陶珠串饰则由陶珠和两颗石坠穿联而成，悬挂于东、西侧板。值得注意的是，横拉于椁室中央四条串饰的终端分别与固定在椁室东西侧板上的一块矩形铜片相接，其中央部分平置于外棺顶板之上，以减少串饰的下坠力，其组成则与上述两种串饰组合相同。从上述情况推测，这些串饰应是作为椁室装饰。据统计，出土铜鱼609条、陶珠3910颗、玛瑙珠（管）1876颗、海贝603颗、石贝869颗。

外棺顶板中南部置有4件铜罍，铜罍上部为“山”字形，下部矩形，宽68、高58、厚0.20厘米，保存较好（图八）。铜罍分南北两组放置，北边1件平置，南边3件叠压放置，且与棺顶南部串饰（M19:121）相互叠压，说明下葬时，铜罍平置于外棺顶板。椁室西南角放置有青铜礼器鼎、簋、壶、甗、盘、盂、盖盆，椁室南端放置4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鬲，除甗足断裂外其余均保存完好。椁室东、南部还有大量的车马器、漆箱饰件等。在外棺四周贴附有10个双龙纹镂空铜环，两两对称，两侧各4件，两端各1件（图五）。

墓主耳部有玉玦，颈部有玉牌组佩饰、玉方管组佩饰等，双手有玉握，手、脚腕及肘部各有一组佩饰，墓主佩带有玉瑗、玉牛首、玉蚕、玉鱼、玉觿、玉柄形器等佩饰（图四）。内棺东北角还放置一件十分罕见的象牙刀盒，盒内无刀。

三、随葬器物

M19随葬器物按质料分为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

(一) 铜器

依铜器的使用功能区分，有礼器、车马器、棺饰等。

1. 礼器

该墓随葬礼器18件，计有鼎4、簋4、方壶2、甗1、鬲4、盃1、盘1、盖盆1。其中铜鬲铸有铭文。

鼎 4件。可分为A、B两型。

A型 3件。形制纹样相同，大小相次。宽折沿，方唇，敞口，立耳，圜底，兽蹄形足。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标本M19：186（图九，3；图一四；图二〇，2），口径25.6、通高23.5厘米。

B型 1件（标本M19：187）。折沿，方唇，敞口，立耳，垂腹，底近平，近柱形足。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突起垂鳞纹。口径25.6、通高23.5厘米（图二〇，1）。

簋 4件。形制、纹样、大小相同。标本



图七 M19玛瑙珠串饰及贝类出土状况



图六 M19青铜鱼和玛瑙珠串饰及贝类出土状况

M19：190（图九，2；图二〇，8），浅腹钵形盖，上有圈足式握手。簋身敛口，鼓腹，兽首环耳，平底，矮圈足，圈足下接三小蹄足。器盖、器身均饰瓦棱纹和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口径18.0、通高20.6厘米。

方壶 2件。大小、形制、纹样相同。标本M19：192（图一五；图二〇，4），子母口，长颈，兽首环形耳，垂腹，平底，高圈足。盖饰窃曲纹和垂鳞纹，颈上部饰窃曲纹，下部饰一道凸弦纹，腹上部饰波曲纹，下部饰垂鳞纹。壶口长15.4、宽10.4、通高38.6厘米。

甗 1件（标本M19：196）。上甗下鬲连体。甗侈口，方唇，立耳，斜直壁，底部有活动算。鬲敛口，鼓腹，四分档蹄



图八 青铜器出土状况



1



2



3



4

图九 青铜礼器
1.鬲 2.簋 3.鼎 4.甗



图一〇 M19马甲胄出土状况

形足较高。甗体饰一周窃曲纹和波曲纹。甗口长26.7、宽17.9、通高31.2厘米（图九，4；图二〇，5）。

鬲 4件。形制、纹样、大小相同。器身较矮，平折沿，方唇，敛口，束颈，鼓腹，矮蹄足，蹄足下端稍大，内侧有一道竖向凹槽。腹部与足相对处各有一个月牙形扉棱，腹部饰波曲纹。标本M19：261（图九，2；图一三；图一九，2），口径11.6、通高11.8厘米，沿面呈顺时针方向铸有铭文13字，为“内（芮）公作铸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见图一二。标本M19：260（图一九，1），口径11.6、通高11.8厘米。沿面呈逆时针方向铸有铭文13字，为“内（芮）太子作铸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见图一一。

盃 1件（标本M19：195）。直口，方唇，束颈，椭圆形扁腹，管状流，龙首环形鋈，矮圈足，子母口。盖钮铸成鸟形，栩栩如生。腹腔正背面均饰凤鸟纹，鸟呈站立凝视状，鸟冠高竖，鸟首高昂，鸟喙呈弯钩状，鸟尾低垂。盃口长5.9、宽4.3、腹径14.4、通高19厘米（图一六；图二〇，6）。

盘 1件（标本M19：194）。窄折沿，方唇，敞口，浅腹，附耳，平底，高圈足。腹部饰窃曲文，圈足部饰垂鳞纹。口径28.8、通高10厘米（图二〇，7）。

盖盆 1件（标本M19：197）。盖上隆，喇叭形握手。敞口，短束颈，折肩上有环形双耳，斜弧腹，平底。肩腹交接处饰一周凹弦纹。口径27.6、通高20.1厘米（图二〇，3）。

2.车马器

銮铃 10件。2件置于外棺东北角，8件置于外棺东南角，形制均相同。该器与轭首配合使用。标本M19：251（图二一，3），上部为铃体，下部为方座。铃椭圆形，中部为半球形铃腔，正面自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等距离分布8个三角形镂空，铃腔内有一个弹丸。銮形座呈上细下粗的正方体，四面均有一圆形穿孔，正背两面分别有三角形镂空、4个梭形凸饰和5条竖行凸线。銮座口长4.5、宽3.1厘米，铃直径9.3、通高16.3厘米。

兽面纹铃 2件。出土于椁室南端，形制、大小均相同。标本M19：257（图一八；图二一，2），器身呈上窄下宽的梯形，横截面呈空腔椭圆形，平顶中心有穿孔，上方有方形钮，下口部边缘呈凹弧形，铃腔内有槌状令舌。两面各饰一组纤细的凸线兽面纹。口径9.7、通高14.6厘米。

马甲胄 4件。出土于椁室南端，保存较差，形制相同（图一〇）。标本M19：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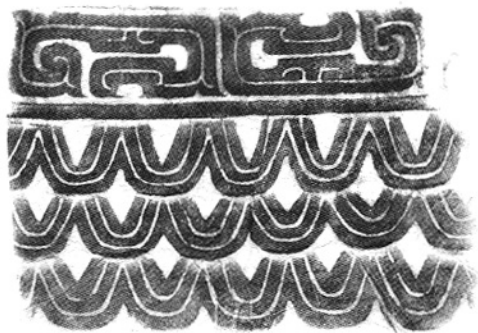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铜鬲（M19：260）铭文拓片（1/3）



图一二 铜鬲（M19：261）铭文拓片（1/3）



图一三 铜鬲 (M19: 261) 腹部纹饰拓片 (1/2)



图一四 铜鼎 (M19: 186) 腹部纹饰拓片 (1/2)



1



2



3

图一五 铜壶 (M19: 192) 纹饰拓片 (3/8)

1.盖 2.颈 3.腹

薄片状，整体呈“R”形，器身遍布几何状镂空。宽30、46、厚约0.2厘米。

3.棺饰

棺环 10件。大小、形制、纹样均相同。贴附于外棺四周，两两对称，两侧各4件，两端各1件。标本M19: 136 (封底；图一七；图二一，1)，环身扁薄，呈连体双龙相对盘



图一六 铜盂腹部纹饰拓片 (1/2)



图一七 铜棺环 (M19: 136) 拓片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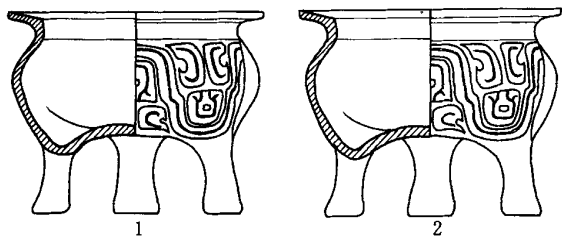


图一八 铜铃 (M19: 257) 纹饰拓片 (1/2)

曲，龙舌相接，龙角向上弯曲，圆眼突出，长鼻上卷，獠牙向下弯曲，龙身饰多道阴线弦纹。外径19.6、内径9.5厘米。

(二) 玉器

共出土66件 (颗)，除玉戈置于棺顶外，



图一九 铜鬲 (均2/9)
1. M19: 260 2. M19: 261

其余均随葬于墓主的面部、躯体和四肢关节处，按其功能分为礼玉和玉佩两类。

1. 礼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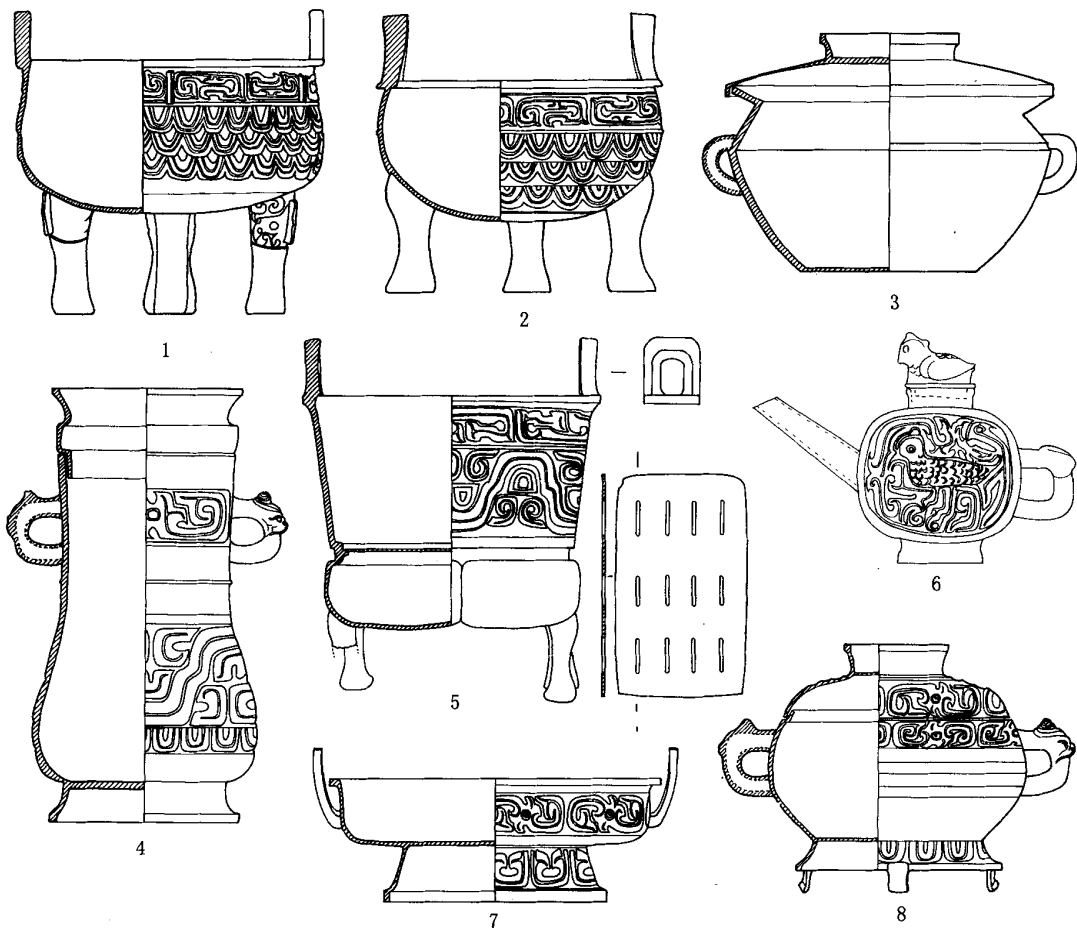
戈 1件 (标本M19: 147)。长期受沁而全身布满棕黄色斑纹或灰白色斑点，玉质无法辨清。直内直援，等腰三角形锋，援上有脊和

边刃，脊线由锋通至内。内中部有一单面钻穿孔。通长23、宽4厘米 (图二五, 9)。

琕 1件 (标本M19: 211)。青玉，由于受沁，大部为黄褐色斑纹。体薄，素面，一面有切割痕迹。外径9.8、内径5.6、厚0.2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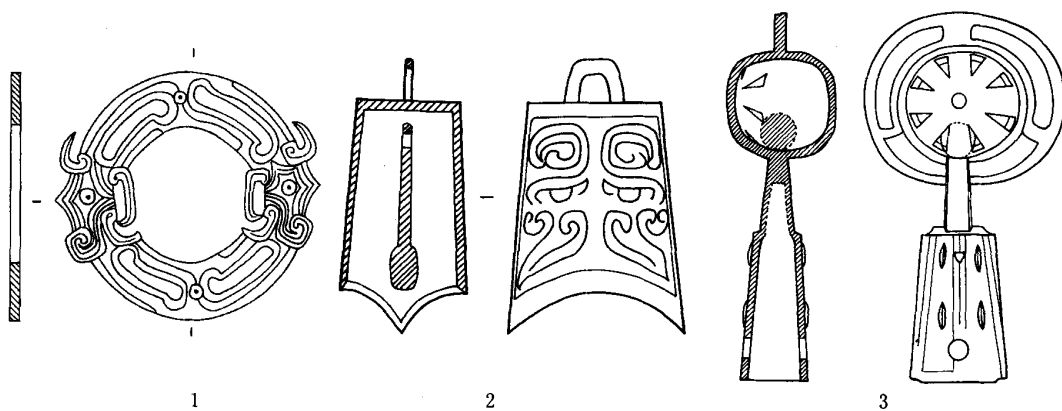
2. 佩玉

玉牌组佩饰 作为项链佩带于墓主胸前。由8件玉牌和56颗玛瑙珠穿联而成 (封面)。其中的5件玉牌形制相同。标本M19: 236 (图二二, 2; 图二五, 1)，片雕，器身呈长方形。正面饰“S”形双龙纹，两龙共用一身，龙首上下相对应；阴线雕刻，椭圆形目，龙首额部伸出一角，龙鼻上卷，张口吐舌，龙身卷曲呈“S”状，突出两燕尾状齿棱。背面平



图二〇 铜礼器 (均1/6)

- 1、2. 鼎 (M19: 187、M19: 186) 3. 盖盆 (M19: 197) 4. 壶 (M19: 192)
5. 甗 (M19: 196) 6. 盂 (M19: 195) 7. 盘 (M19: 194) 8. 簠 (M19: 190)



图二一 铜器

1. 棺环 (M19:136) 2. 铃 (M19:257) 3. 銮铃 (M19:251) (1为1/5, 2为1/4, 3为1/3)



1



2



3

图二二 M19出土的玉器
1. 玉腕饰 2、3. 玉牌



1



2

图二三 1.玉鸟 2.玉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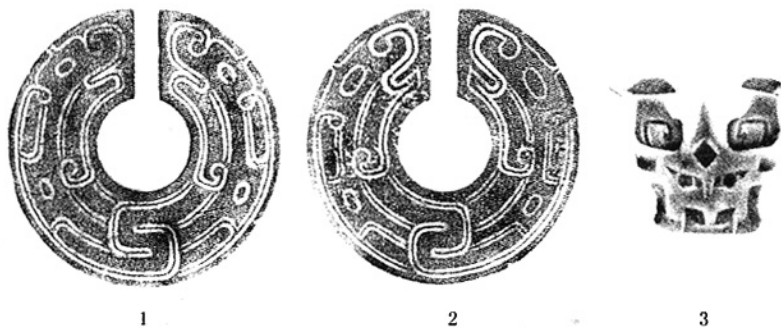
齐，两端分别斜穿三孔。长5.3、宽2.8厘米。标本M19：237（图二二，3；图二五，2），片雕，器身呈弧边长方形。正面饰双龙首纹，龙首上下左右对称，阴线雕刻，椭圆形目。一龙首额部伸出一角，龙鼻上卷，张口吐舌，龙角下方对钻一穿孔；另一龙首只雕出眼与獠牙，其余部位省略。背面平齐，两端分别斜穿三孔。长5.4、宽3.1厘米。

玉腕饰 佩带于墓主左手腕部。由1件玉贝、2件玉鸟、6件玉蚕、54颗玛瑙珠穿联而成（图二二，1）。玉贝，见标本M19：221（图二五，8），青白玉，冰青色，局部受沁有灰白色或棕黄色斑纹，半透明。呈海贝状，正面隆起，中部纵刻一凹槽，背面近平，其中部两侧浮雕两个乳丁状凸饰，并饰有波曲纹，上端对穿一圆孔。长2.1、宽1.6、厚0.8厘米。玉鸟，形制相同，大小相异。标本M19：218-

1（图二三，1；图二五，5），圆雕，青白玉，受沁略泛黄。鸟呈蹲伏状，大弯钩喙，鸟首高昂，翅膀卷收，背部阴线刻出一心形纹饰，尾部分叉，鸟足雕成台状，台中央十字形交叉对穿两孔。通高1.9厘米。玉蚕，多作为串饰组件，分大、中、小三种。其中标本M19：220-1（图二五，7），青白玉，冰青色，平头直身尖尾，周身饰有节纹，嘴下有一斜穿，长1.6厘米；标本M19：220-2，青白玉，豆青色，微曲，长1.6厘米；标本M19：219-2（图二五，4），青白玉，因受沁略呈黄色，平头曲身尖尾，周身饰有节纹，长3.8厘米。

玉块 6件。成对出土。标本M19：225（图二三，2；图二四，1、2；图二五，3），出土于墓主耳部。青玉，豆青色，受沁略泛黄，玉质细腻，微透明。两面刻双龙合体纹饰，龙首相对，龙角上卷，椭圆形目，卷鼻张口，躯体作缠尾状。外径4.1、内径2.8、厚0.4厘米。

玉牛首 2件。出土于墓主足部，左右各一。标本M19：201（图二四，3；图二五，6），正面浮雕出牛面，额部正中有一菱形突起，两端各伸出一大平角，目字形眼，牛鼻上卷，侧面伸出双耳，背面平齐。宽2.5、厚0.45、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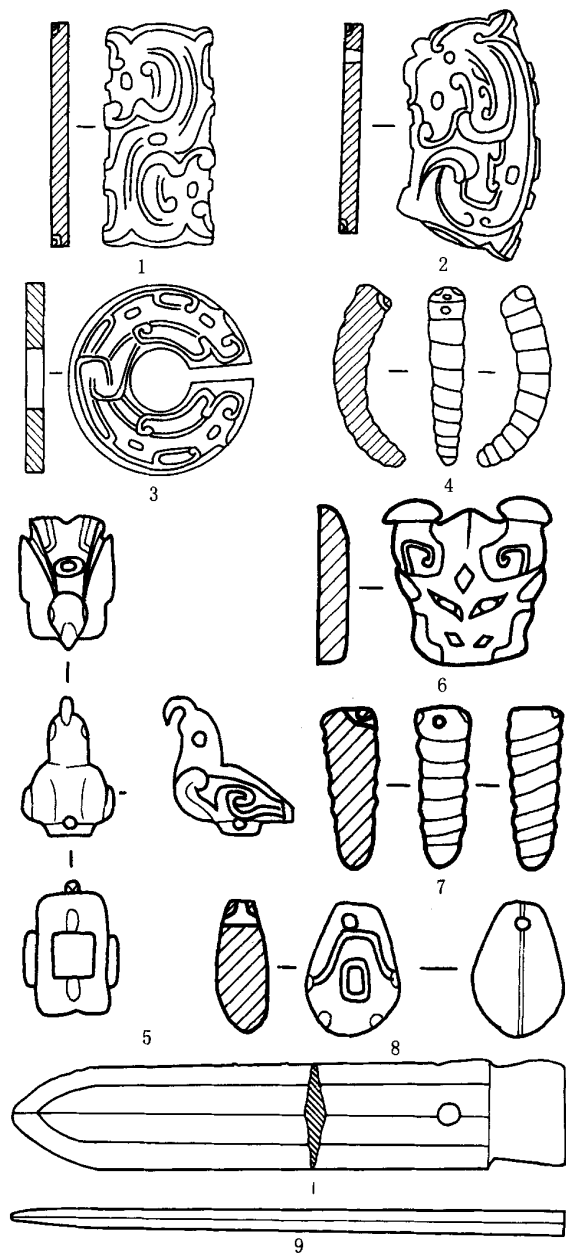
1

2

3

图二四 玉器拓片（原大）

1、2.玉块（M19：225） 3.玉牛首（M19：201）



图二五 玉器

- 1、2.玉牌饰 (M19: 236、M19: 237) 3.玉珪 (M19: 225)
4、7.玉蚕 (M19: 219-2、M19: 220-1) 5.玉鸟 (M19: 218-1) 6.玉牛首 (M19: 201) 8.玉贝 (M19: 221) 9.玉戈 (M19: 147) (1~4为2/3, 5~8为1/1, 9为1/3)

高2.5厘米。

(三) 漆木器

18件。木胎已完全腐朽，仅存部分髹漆，色彩有朱、黑两色，器形有屏风(?)、箱、豆等。其中在椁室东部有一屏风状漆器和

漆箱，彩绘图案清晰，色彩鲜艳。

箱 1件 (标本M19: 171)。出土于椁室东部。长方形，朱底黑彩，正面绘制凤鸟纹和网状纹。残长80、残宽18.5厘米。

屏风(?) 1件 (标本M19: 266)。出土于椁室东部，紧贴外棺东侧板。长条形，底色为朱色。正背面均有一层黑色网状纹、竖平行线和辫索纹，纹饰之中整齐地镶嵌有圆形蚌泡。纹饰分为3个单元。残长120、残宽40、厚1.0厘米。

(四) 其他

象牙刀盒 1件 (标本M19: 263)。盒身由上下两部分扣合而成，其内部雕出弧背刀形空腔。长方形，规整精致，整体抛光。两面各雕有两两相对的镂空“S”形双龙纹。长16.8、宽3.7、厚0.9厘米 (图二六)。

海螺 6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标本M19: 264-1，利用天然海螺整修而成，整体抛光，高6厘米。

四、初步认识

梁带村M19形制大，保存好，等级高，遗存丰富，是继宝鸡强国墓之后陕西地区30年来首次发现的未被盗掘的周代大型墓葬，为我们研究周代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尤其是周代的封国史具有重大意义。因室内整理工作还未完成，下面仅就M19的主要收获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 墓葬年代

M19未发现陶器，依目前对两周青铜礼器比较成熟的分期成果，其年代当为春秋早期。如M19出土的甗 (M19: 196) 和方壶 (M19: 192) 分别与陕西陇县79LBM1: 11、8甗和方壶相同^①；方壶、A型鼎、簋则与晋侯墓地“晋侯家父”方壶 (M93: 31)、鼎 (M102: 11)、簋 (M93: 33) 相同或接近^②，上述陇县79LBM1和晋侯M93和M102被认为是春秋初期的墓葬，所以梁带村M19的年代定为春秋早期当不会有大的问题。

(二) 关于墓地的国别



图二六 象牙刀盒(1/2)

M19出土的4件青铜鬲口沿铸有“内(芮)太子”和“内(芮)公”的铭文,而未见其他国名,或许说明了M19为代表的梁带村墓地属于芮国墓地。但有两点疑问,一是尽管出土了“芮”字铭文铜器,但毕竟是孤证,梁带村墓地的国别问题目前尚难以确指;二是据《史记·秦本纪》注解记载,古芮国在今陕西大荔一带,而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载:“梁氏,伯益之后。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子孙以国为氏。”韩城又为春秋梁国所在,孰是孰非,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毕竟梁带村墓地的发现和M19的发掘为解决梁、芮地望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当然这还有待于梁带村M27“中”字型大墓的进一步发现,更有待于墓地的大面积揭露而获取更多的资料,尤其是文字资料。

(三) 墓主身份

从梁带村M19的形制和规模与山西晋侯墓地^③、三门峡虢国墓地^④的墓葬规模比较看,墓主身份当不低于诸侯。梁带村M19与M26、M27并排埋葬,且又未出兵器,再根据墓内所出的四鼎四簋,M19最有可能为夫人墓。

(四) 前期遗留与改形器

M19出土了众多玉器,据初步观察,许多为早期遗留物。如M19:201玉牛,牛角为“蘑菇角”,刀法苍劲有力,眼为“臣”字眼,这种造型和雕刻手法在殷墟妇好墓的玉器中常见^⑤,说明其年代为商代。M19:236玉牌则与晋侯墓M102:7的龙纹玉牌^⑥无论是题材还是双龙上下左右对称的设计和雕琢手法,几乎完全相同,显系西周晚期的典型作品。除早期遗留外,M19又有不少的改形器。如M19:

237玉牌,平面形状为弧边长方形,一端有穿孔,另一端残留有同玉牌双龙图案完全不相容的短平行线,显然该器是玉璜的改制品。从玉牌的主题图案与原器残留雕琢痕迹看,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不大,可谓同期改制。

与梁带村M19年代接近的芮国铜器历史上屡有出土,早在宋代即有发现,吕大临《考古图》、清代的《西清古鉴》就有著录。查吴镇烽《金文通鉴》,著录带有“芮公”铭文的铜器达19件,带有“芮太子”铭文的铜器有7件,唯山东黄县庄头村M1出土的“芮公叔”簋为科学发掘品,因此,梁带村M19“芮”器的发现对于芮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附记:在发掘过程中,刘云辉、焦南峰、王占奎先生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派出研究生参与发掘和整理工作。陕西省武警第二支队、韩城市公安警村派出所、梁带村文管所为保护墓地的安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对发掘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领队:孙秉君

发掘:赵县民 梁存生 孙韶华 王 安

张 伟 陈建彬 刘银怀 陈江峰

执笔:孙秉君 程蕊萍 陈建凌 王仲林

张 伟

摄影:张明惠 陈建凌

绘图 拓片:程蕊萍 屈麟霞 李建峰

注 释

①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

②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

③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1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责任编辑 李自智)